

改变世界历史 的二十五年

刘宗绪 主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法国大革命探新

K565.41
16
2

改变世界历史的二十五年

主编 刘宗绪

编著 刘宗绪 高韵青

姜 芃 李 玥



河北人民出版社

B

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

刘宗绪：绪论、第二、五、六章，第四章（第三节）。

高韵青：第一、三章，第四章（第一、二节）。

姜 芑：第七章

李 玥：第八章

刘宗绪 高韵青：附录。

381

改变世界历史的二十五年

刘宗绪 主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 毫米 1/32 12.75 印张 316,000 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4.95 元

ISBN 7-202-00562-x/K·77

绪 论

十八世纪末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从它爆发不久，直到今天，始终被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大革命”。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次革命的作用之大和影响之深。列宁认为：“法国大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①

在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到来之际，我们遵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对这次大革命作一些新的探讨，作为对它的纪念。

一

法国大革命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法国国界；它对欧洲，乃至全世界，都有极大的震动。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668页。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世界上只有三个资本主义国家，即荷兰、英国和美国。其他国家和地区，都还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之中。当时，从主流上说，人类社会正处在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时代。尤其是在欧洲，十六世纪的尼德兰革命和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已使这一过渡大大加速了。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法国大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上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法国革命后，资本主义的历史潮流便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了欧洲大陆，而且对美洲也产生了影响。马克思指出，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都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①列宁也指出：“拿法国大革命来说吧。它被称为大革命不是没有道理的。……整个十九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②

法国大革命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进行了打倒本国封建势力的激烈斗争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长期战争，克服了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种消极因素，其所达到的激烈程度及各类矛盾之错综复杂，均为近代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所仅有。没有哪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思想准备方面达到法国启蒙运动那样成熟的程度。法国启蒙思想家高举的理性大旗，成为当时的时代的旗帜。也没有哪一国的革命者象法国革命家那样重视立宪问题，以极其认真的态度深入细致地讨论和制定宪法。在法国大革命起伏跌宕的二十余年中^③，革命家们曾先后制定过八部宪法，在资产阶级法制的创立和发展上，在资本主义宪政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连同《拿破仑法典》，这些法制文献对各国资产阶级制宪和立法都产生了巨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1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851页。

③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起止年代，国内史学界有不同意见。较为常见的有三种，即1789—1794年、1789—1799年、1789—1814年。本书取第三种意见，既包括夺权斗争的高涨时期，又考虑到巩固成果的时期。

影响。法国革命中出现的极具威力的无套裤汉运动，巴黎无套裤汉举行的多次胜利的武装起义，数量众多的革命团体和报刊，都作为有效的斗争手段，为后来各国革命者当成可贵的经验而不同程度地加以采用。在大革命中因一时的特殊形势而两次出现过的集权式的政权，即雅各宾派执政时实行的恐怖统治和拿破仑的军事独裁，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具有着十分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令人生畏的恐怖统治实质上是采用了马克思所说的“平民方式”，以暂时限制和打击资产阶级的手段去夺取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是法国革命所独具的现象。而随着革命胜利的取得，又必须退回到资本主义的正常统治秩序中去，实现稳定。为克服混乱，强行稳定下来，造成了势必要出现军事独裁政权的客观形势。法国大革命就以这种使人眼花缭乱的政治变迁，体现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复杂的历史进程。它充满着革命的历史首创精神，它的极为丰富的历史经验是后来一切革命者的宝贵财富。直到二十世纪初年，列宁还曾多次引用法国大革命中若干事例，借以教育无产者去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二

正由于法国大革命影响巨大，经验丰富，因而引起各个阶级和政治派别的极大兴趣，人们纷纷去研究它、剖析它，从中引出适合自己的经验和结论来。因此，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史学，从革命爆发时就随之产生了。在以后的两个世纪里，大革命这一事件始终是史不绝书的热门研究课题。

早在1792年，大革命初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制宪议会成员巴那夫就发表了他的《法国革命引论》一书。他敏锐地观察到，国家制度是受财产所有制制约的，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必

然要改变贵族化的国家制度。他写道：“一旦工艺和贸易在人民当中蔚然成风，并且为劳动阶级获得财富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手段，那末，一场革命就在政治法律的领域中开始酝酿了。权力的再分配乃是财富再分配的产物”。^①相当深刻地探索了革命发生的根源。在革命期间，还出现了勒克雷代尔、斯塔尔夫人的直接论述大革命的著作。

在复辟王朝时期(1815—1830年)，出现了研究大革命的高潮。当时，曾受到马克思称赞的以阶级斗争观点解释历史现象的梯也尔、米涅、基佐、梯也里等人，分别写出了关于大革命的有影响的著作，并且将革命解释成第三等级对特权等级进行的阶级斗争。这些著作回避了第三等级内部的阶级差异，但仍是当时反对复辟王朝斗争的思想武器，在大革命的史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1830年七月革命的胜利，使政权回到资产阶级手中。代表金融资产阶级的奥尔良王朝以大革命的继承者自居，从而为大革命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空想共产主义者P·J·B·布歇与P·C·卢合作主编了四十卷的资料集《法国革命的议会史》，于1834—1838年出版。到四十年代后期，七月王朝的统治已成为历史发展的障碍，在反抗运动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出版了共和派成员拉马丁的《吉伦特派史》、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的十卷本《法国革命史》第一卷和进步的共和派史学家米什莱的《法国革命史》。在史学史上米什莱的著作有着重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他在书中十分强调人民的作用，认为只有人民才是这场革命的自始至终的主人。更重要的是，他的著作是在研究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比以往的和当时其他人的著作具有更大的科学价值。

到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年)，在刚刚度过1848

① 巴那夫：《法国革命引论》(Barnave, Introduction à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巴黎，1971年版，第9页。

年的革命风暴和第二共和国时期动荡不宁的四年之后，在经历了自大革命以来半个多世纪变幻不定的政治局面之后，许多人对第二帝国建立起来的相对稳定的秩序感到欣慰。一些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史学家也倾向于稳健、温和的观点。托克维尔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这部书有着极大的学术价值。它第一次认真研究了法国的旧制度，从旧制度的社会经济矛盾中去探索革命的原因，从而为大革命史的研究开辟了十分重要的新领域。在史学方法论上，托克维尔强调了历史的连续性，颇有见地地指出了旧制度下某些事物同革命的成果相一致的地方。不过，也正是根据这一点，他极力宣扬渐进的观点而不赞成革命的突变。然而对于大革命的基本成就他还是予以肯定的。

在法国以外，十九世纪上半期也出现了一些别国学者写的有影响的著作。1837年出版的英国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全由文学语言写成，曾轰动一时。德国的希伯尔所著《1789—1800年革命时期史》从1853年起陆续出版。这部五卷集的著作第一次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研究了法国大革命。但是它极力宣扬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在观点上是反动的。

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形成第二次高潮的，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的一批出色的史学家。他们之中有进步的、严谨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史学家奥拉尔、马蒂埃、勒费弗尔，还有力图以唯物史观从事研究的工人运动领导人饶勒斯，也有以保守的甚至反动的观点论述大革命的泰纳，以及继承托克维尔渐进历史观的索雷尔等。

泰纳所著《现代法国之起源》对大革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索雷尔写出了八卷集的《欧洲与法国革命》。这是法国学者从国际关系角度论述大革命的第一部著作，但在观点上是趋向保守的。

只是从奥拉尔开始，才开创了大革命研究的新的、被称为“科学的”阶段。奥拉尔是1886年设立的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

的第一位教授。他在1887年开始主编《法国大革命史评论》，1888年又创建了“法国革命史研究会”。这个刊物和机构至今仍是大革命研究的中心和重要园地。还在1882年奥拉尔就发表了专著《制宪议会演说家》。随后写下了大量论文，后来整理出版的论文集达九卷之多。他按不同的主题和历史时期编辑出版了数十卷大革命资料集。1900年问世的他的代表作《法国革命政治史——民主政治和共和国的起源和发展》，迄今仍是广泛流传的世界名著。奥拉尔以其民主的共和主义思想和严肃科学的治学精神，开创了一个学派。

与奥拉尔同时，饶勒斯用社会主义观点研究了法国历史，特别是大革命史。1901—1904年出版了他所写的四卷本《社会主义史》，论述1789—1794年的法国。后来马蒂埃将此书再版，定名为《法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史》，分八卷于1922—1924年出版。饶勒斯力图把大革命史的研究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之上，着力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他在肯定革命中人的作用和意识形态的作用的同时，更强调“经济条件、生产和所有制形式是历史的最深远的根据”。^①饶勒斯还认真研究了下层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在三级会议召开前夕所提出的“陈情书”，提出了当时还存在着更为贫困的“第四等级”的说法。他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上作出了重大贡献。1903年他创立了“大革命经济史未刊史料搜集和出版委员会”，并担任主席。该团体陆续印行的史料为更加科学地研究大革命奠定了不可缺少的基础。

在二十世纪初年，继奥拉尔、饶勒斯之后出现的最优秀的史学家是马蒂埃和勒费弗尔。马蒂埃是奥拉尔的学生，其国家博士论文就是在奥拉尔指导下写成的。但是马蒂埃是比奥拉尔更为激进的

^① 饶勒斯：《法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史》（J·Jaurès, Histoire socialist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第1卷，巴黎，1927年版，第23页。

共和主义者，十月革命后还曾一度参加共产党。1907年由于在观点上的严重分歧，他与老师分手，接着就创建了“罗伯斯比尔研究会”和《大革命年鉴》。^①马蒂埃在研究上的主要贡献集中在大革命中的国民公会时期，特别是集中在雅各宾派和罗伯斯比尔这一人物之上。他不仅从政治角度，而且从经济和社会改造的角度从事研究，因而在理论上、研究方法上和所取得的成果上，都超过了前人。他重视革命时期下层群众的运动，大胆肯定“恐怖统治”的历史进步作用，热情颂扬遭到多数史学家指责的革命领袖罗伯斯比尔，作出了一系列更加接近真理的结论。马蒂埃一生写下三十余部著作，其中，三卷集的《法国革命史》和内容上与之衔接的《热月反动》以及未正式完成的《督政府治下的法国》，都以翔实、精选的史料论述了大革命中各派政治力量的意向及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是极有学术价值的名著。此外，他的《罗伯斯比尔派研究》（再版时改称《恐怖时期议会的腐败》）、《恐怖时期的物价高涨和社会运动》等著作也都在专题研究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马蒂埃更重视的仍然是政治斗争和资产阶级的派系，没有把经济、社会状况的研究放在应有的地位上。

马蒂埃的不足之处在同时代史学家勒费弗尔那里得到了补充。勒费弗尔是至今仍在法国乃至国际史学界保持巨大影响和声望的史学大师，虽然他已于1959年逝世。他的研究工作从一开始就是在饶勒斯的影响下进行的，非常重视社会经济史的研究。1932年马蒂埃去世后，他曾高度评价马蒂埃的贡献，但也指出了他很多“向下看”的缺点，并且提出：“未来的历史学家如果想从下面而不是从上面去考察事件的话，那就应将研究经济、社会置于首位。”^②勒费弗尔在研究方法上有许多独到之处，对后人产生了

① 此刊初建时是为了与奥拉尔的《法国大革命史评论》抗衡，后两刊于1924年合并，称《法国大革命史年鉴》，至今还按期刊行。

② 勒费弗尔：《法国革命研究》（G·Lefebvre, Etudes su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巴黎，1963年版，第49页。

很大影响。他强调研究经济变化,认为大革命的深刻原因应从“由经济变化引起的社会进化中寻找。”^①而在研究经济变化时,必须借助统计学的方法。历史虽不同于实验科学,但也可利用考古学、地理学、语言学、心理学、人口统计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去进行对历史遗迹的考察和考证性推论,以使历史学更加科学。他强调精确的统计,但同时提出统计不能取代历史的理论分析。勒费弗尔在极力强调研究经济的同时,毫不忽视对人的研究,始终坚持“历史是人的活动”。他尤其重视人民群众,鲜明地提出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广大人民是“历史之光”。^②在研究人时,他运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承认在第三等级内部农民、工人与资产阶级是不同的,有自己革命的动机。他并不是生硬地进行阶级归类,而是具体研究人的心理,包括个人心理和集体心理。在探索法国大革命的发展道路时,他又使用了比较研究法,对不同国家的特点进行了认真分析。不过,勒费弗尔毕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还持有异议,不赞同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的观点,只承认历史上有一种“常数”。他还过于强调群众运动的自发性,轻视领导力量、学说与思潮等对群众的影响。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他还常常过多地强调个人气质所起的作用。

勒费弗尔以他洋洋百万言的博士论文《法国革命期间的诺尔郡农民》震动了史坛。包括奥拉尔(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在内的许多权威史学家,对论文的材料之丰富而精确,分析说理之深刻而细腻,无不由衷地赞叹。勒费弗尔对旧制度晚期和革命时期土地问题与农民状况的研究,为大革命的史学开拓了新的领域,对法国从封建时代过渡到资本主义时代的进程作出了更加科学的解释。勒费弗尔在这方面的著作还有《旧制度末期土地所有制和

① 勒费弗尔:《历史的思考》(G. Lefebvre, *Réflexion sur l'histoire*)巴黎,1978年版,第240页。

② 勒费弗尔:《历史的思考》,第116页。

土地经营的分布》、《国有财产的出售》、《恐怖时期的土地问题》、《法国大革命与农民》等，同时还写出了研究群众心理的专著《1789年大恐慌》、《革命群众》以及综合性的论著《法国大革命》。

与马蒂埃、勒费弗尔同时代的研究大革命的著名史学家还有拉维斯、萨义塔、瑟诺博斯、萨涅克、帕里塞等。以反动观点论述大革命的马德兰也发表了不少著作。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法国以外研究大革命最富成效的，是被称为“俄罗斯学派”的几名俄国学者，包括卢契茨基、卡列也夫、卡瓦列夫斯基等。他们多次到法国查阅资料，对大革命前后法国的土地问题和农民状况进行了专题的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卢契茨基是研究法国革命土地问题的第一人，写出了《十八世纪法国革命前的农民土地占有制》、《革命前法国农民土地占有制和国有财产的出售》、《革命前法国的土地占有者阶级和1789—1793年的土地改革》等著作。勒费弗尔的研究就是在他的成果的基础上开展的。此外，卡列也夫和卡瓦列夫斯基的著作，也都是很有价值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所写《法国大革命》也是很有影响的著作。

二十世纪初研究法国大革命最有成就的俄国史学家是塔列列。十月革命后他是俄国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法国史的开路人之一。他研究的重点是法国的工业与工人阶级以及某些历史人物，主要著作有《1789年至1791年的法国国家工场工人》、《革命时期法国的工人阶级》、《旧制度末期法国农村中的工业》、《拿破仑》、《塔列朗》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史学有了新的发展。传统的、注重史实考证并以研究政治史为主要内容的史学家们，仍在不断著书立说。例如朗格鲁瓦、阿尔方、瑟诺博斯等等。同时，与传统治学方法迥异的“年鉴”学派发展了起来。

“年鉴”(Annales)一词得名于1929年勒费弗尔和布洛克创办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他们反对传统学派的考据方法和只注重政治史的狭隘的研究范围,提出要研究“全面历史”(histoire totale),即除政治史外,更要重视研究经济、社会、人口、文化以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心理、气质、地理因素等等。这一学派在战后得到很大发展。从1946年起,他们的杂志改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布罗代尔。在法国史学界享有盛名的拉布鲁斯也采用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他没有表示自己属于这一派,但年鉴学派则把他视为自己的代表。拉布鲁斯在《十八世纪法国的物价与收入变动概述》和《旧制度末期与大革命初期法国的经济危机》两部代表作中,强调了必须研究社会经济的“局势”(conjoncture)和“结构”(structure)的主张,以此来探索经济变化的规律。“局势”与“结构”的提法,后来就成为年鉴学派著作中十分常见的字眼。拉布鲁斯向国内外史学界呼吁,对大革命前后法国资产阶级的职业、地位、收入情况进行广泛的统计,取得了十分珍贵的数据。1976年出版的由布罗代尔和拉布鲁斯两位年逾古稀的学者主编的八卷巨著《法国经济与社会史》,是当今法国经济史学科中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其中第三卷前两个分册论述大革命年代。

当前活跃在法国史学界的新一代年鉴学派史学家已自称“新史学派”。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在大革命史的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如肖尼、拉杜里、勒高夫、费罗等。也有个别人发表了荒谬的意见。现任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长孚雷在他的《思考法国大革命》以及他与李舍合著的《法国大革命》中,就歪曲历史,断言大革命只是哲学家们煽动起来的。他们把大革命中人民群众的斗争和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的胜利,说成是革命“侧滑”到歪路上去的表现,并且完全否定雅各宾派实行的革命恐怖政策。

与此同时,国际上也有一些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给予了否定

的评价，否认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甚至根本否认这是一场革命。这些史学家中较有影响的是美国的帕尔默、爱森斯坦（后来改变了看法）、泰勒，英国的科本等。

但是，在各国史学家中以进步观点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毕竟占多数。不少人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进行研究。苏联的曼佛列德、列甫宁科夫、阿多等人，写下了大量著作，对大革命的进程、革命中的雅各宾派政权、土地与农民问题、巴贝夫平等派运动和丹东、罗伯斯比尔、拿破仑等资产阶级革命家，都作出了很精辟的论述。英国的多布、日本的高桥也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法国大革命并作了重大贡献的史学家。

战后对法国大革命研究作出最大贡献的还是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包括勃吕阿、维拉尔、马佐里克、安凯尔、索布尔、沃维尔等。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是阿尔贝·索布尔。^①他是勒费弗尔的学生，师承勒费弗尔，以下层群众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题为《共和二年的巴黎无套裤汉。人民运动和革命政府。1793年6月2日—共和二年热月9日》。这篇长达百万字的论文获得了极大成功。索布尔以近十年时间搜集起来的丰富资料，深刻而根据确凿地论证了无套裤汉的构成、特点、基本要求、斗争手段和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还对罗伯斯比尔和雅各宾派政权作出了超出前人的正确评价。

索布尔以1760年至1815年的历史过程作为研究范围，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法国大革命发展道路的成系统的观点。他对旧制度末年的衰落、大革命的特点、革命中各个派别和代表人物的评价、农民运动的作用、拿破仑帝国对稳定大革命成果的意义等，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非常尊重自己的老师，称勒费弗尔是

① 索布尔（A·Soboul）于1981年曾来华讲学，所讲内容已译为中文，以《法国大革命史论选》为题，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索布尔教授在1982年9月突然病逝。生前是巴黎第一大学法国大革命史讲座教授。

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大师”，将其著作奉为“经典”。但是，他更尊重科学，而且在研究中毫不含混地在若干问题上特别是关于农民运动的作用问题上，表示不赞同勒费弗尔的意见。索布尔著述甚丰，所写专著及主编的资料集，共三十余部，包括《革命前夕的法国》、《法国大革命，1789—1799年》、《文化与法国革命》、《第一共和国，1792—1804年》、《第一帝国，1804—1815年》等等，还参加了布罗代尔、拉布鲁斯主编的《法国经济与社会史》、马佐里克、安凯尔主编的《法国现代史，1789—1980年》等多卷集巨著的写作。

索布尔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国大革命中，也有某些不足之处。他似乎对阶级分析的观点作了较为生硬的理解，因而把对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和吉伦特派划入了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阵营。同时，对革命开始后仍健在的不少启蒙思想家，也作出了过份苛求的否定性评价。

目前，法国史学界在密特朗政府支持下正积极筹备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又将有一大批新的成果问世。

在我国，关于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对此，端木正教授已有专文^①详细阐述，这里不再赘言。

三

本书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在继承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作一些新的探索。在着手进行这一工作时，我们主要考虑了以下一些问题：

法国大革命属于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所谓“早期”，是指它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因而有着不同于产业革命以后的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特点。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次革命

^① 见《法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4年版。

又发生在人类社会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时代，这就必须把握时代的特征，从时代的高度对它进行评论。那时，提到世界历史日程上来的革命只有一种，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这是我们在考察历史事件时不可忽略的客观形势。

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社会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如何，这是需要首先搞清楚的问题。为了烘托将要爆发的革命，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封建制度的矛盾，因而过份地形容当时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程度，是不妥当的。应该说，那时的工业还处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上，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业还是由商业资本控制的。最初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都是由商人创办的。从事贸易活动的包买商提供原料，由受雇的劳动者为其加工成商品成品，雇主为此付给劳动者一定酬金，也就是工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分散的手工工场。某些大商人后来又发展一步，不仅提供原料，而且提供统一的生产工具，与受雇者建立起一种完全的雇佣关系，这就是集中的手工工场。这就是说，绝大多数手工工场的主人原本是商人，是商业资本占居主导地位。只有个别规模巨大的工业企业才不受商业资本控制而独立经营。这就决定了不能够以近代意义上的真正工业资本主义的标准去设想或描绘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发展水平。十八世纪法国也出现了即使在全欧洲也是属于第一流水平的大企业，如勒克勒佐冶金公司、昂赞煤矿公司等，但那仅仅是个别企业，并不能反映当时工业发展的普遍的程度。

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中，最活跃的、经济实力最雄厚的是金融资本。由包税人、银行家等为主要成份而组成的金融资产阶级，是那时法国社会上最富有的人。他们通过替政府包税和向国家放债而左右着国家的财政命脉，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上，都是一般工商业资产阶级不能望其项背的。他们是当时整个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探讨法国大革命的背景和革命进程时，需要十分重视这一事实。

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一批经营矿业和冶金业的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即自由贵族。在整个法国工业中集中程度最高的就是采矿和冶金行业。在这方面的大企业，多半是自由贵族经营的。这个在属性上纳入资产阶级范畴而在社会身份上又属于贵族的集团，其经济主张和政治态度往往是同金融资产阶级一致的。

上述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必然使社会各阶级的情况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仅仅用一种常见的套语，指出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主力军是广大人民群众，革命对象是封建贵族等等，并不能据以解释革命中许多复杂的现象。

那时，还没有形成近代意义上的工业资产阶级和产业无产阶级。以近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来衡量，当时的资产阶级还是很不成熟的。他们在反封建斗争中提出了自由、平等的口号，这主要是为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王权、神权和特权。而在经济活动中，在企业经营中，他们还没有一套管理制度，往往借用封建家长制的办法进行管理，在经济政策上则一味奉行保护主义原则。在国家管理上也缺乏经验，更多地倾向于保留君主制度。他们重视立宪，而立宪的首要目的是限制王权，还不完全懂得代议制度在管理国家上的意义和作用。正因为如此，在需要政权转手时，他们最常采用的手段是发动政变。甚至在特别需要的时候，还不惜建立起违反常规的独裁制度。

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这个不够成熟的资产阶级才有条件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他们的不成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没有理由用超越时代的标准去要求他们。因此，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也是时代决定的。下层人民群众是革命的主力军，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他们却是在资产阶级提出的纲领口号下进行斗争的，极少出现完全以自己的纲领为奋斗目标的独立的下层群众运动。即使出现这样的运动，其要求也是和资产阶级革命相联系的，大多不